

基于生成机制的城市风景遗产集群保护策略研究

Study on Cluster Conservation Strategy of Urban Landscape Heritage Based on Generative Mechanism

毛华松^{1,2*} 孙少彬¹ 程 语¹
MAO Huasong^{1,2*} SUN Shaobin¹ CHENG Yu¹

(1. 重庆大学建筑城规学院, 重庆 400044; 2. 山地城镇建设与新技术教育部重点实验室, 重庆 400044)
(1. School of Architecture and Urban Planning, Chongqing University, Chongqing, China, 400044; 2. Key Laboratory of Mountain Town Construction and New Technology, Ministry of Education, Chongqing, China, 400044)

文章编号: 1000-0283(2022)07-0004-09
DOI: 10. 12193 / j. laing. 2022. 07. 0004. 001
中图分类号: TU986
文献标志码: A
收稿日期: 2022-06-02
修回日期: 2022-06-14

摘 要

虽然中国近年来对城市中自然遗产和文化遗产保护重视不断提升, 但以目标单体为主的遗产保护手段导致遗产与其原生文化背景、周边环境及遗产集群之间关联脱离, 进而影响遗产原真性和完整性的情况普遍存在。在梳理城市风景遗产以及集群内涵、特征的基础上, 提出基于生成机制的城市风景遗产集群保护思路, 并以重庆市中心城区长江文化艺术湾区为例, 以史料、田野调查为支撑, 以 GIS 空间统筹技术为辅助, 识别地段内城市风景遗产资源; 解析农耕、民国、建国初期三个关键时期空间关联、事件关联、功能关联的差异机制与相应集群特征; 再综合城市规划、基础设施、产业功能等场地条件, 提出基于“遗产—环境”“遗产—遗产”“遗产—城市”三层次的全面要素保护、关联结构重建、融合机制营造的在地性保护措施。探索了基于生成机制的可持续性集群保护体系, 丰富了城市风景遗产在地性保护的方法和策略。

关键词

风景遗产; 城市风景遗产; 生成机制; 集群; 保护策略

Abstract

Although the importance of urban natural and cultural heritage conservation in China has been increasing in recent years, the target-based methods of heritage protection have led to disconnections between heritage and its original cultural context, surrounding environment and heritage clusters, resulting in the loss of some of the originality and integrity of heritage. Therefore, this paper proposes an idea of urban landscape heritage cluster conservation on the basis of the generation mechanism, which bases on a clear understanding of urban landscape heritage and the connotation and characteristics of clusters, and takes the Yangtze River Culture-Art-Bay area in Chongqing as an example. Through historical material and field research, combined with GIS kernel density analysis, the urban landscape heritage was identified, and the different spatial, events, functional association mechanisms and their cluster structures in agriculture, the Republic of China, the early founding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were analyzed. Combined with local conditions such as urban planning, infrastructure and industrial functions, the “heritage-environment” “heritage-heritage” “heritage-city” conservation methods are proposed based on three aspects: comprehensive element protection, reconstruction of structural links, and creation of integration mechanisms, so as to explore a sustainable conservation system based on the generation mechanism of urban landscape heritage with clustering effects, and enrich the local conservation methods and strategies.

Keywords

landscape heritage; urban landscape heritage; generation mechanism; cluster; conservation strategies

毛华松

1976 年生 / 男 / 浙江诸暨人 / 教授、博士生导师 / 山地城镇建设与新技术教育部重点实验室 / 研究方向为风景园林历史与理论、风景园林规划与设计

孙少彬

1998 年生 / 男 / 湖北武汉人 / 在读硕士研究生 / 研究方向为风景园林规划与设计

程 语

1994 年生 / 女 / 四川乐山人 / 在读博士研究生、科研助理 / 研究方向为风景园林历史与理论

风景遗产是“满足人对大自然精神文化
活动需求的地域空间综合体”^[1], 而城市作
为人与自然相互作用形成的产物, 其形成一

定伴随着风景遗产的产生, 并且根据人作用
于自然的需求差异形成类型不同的城市风景
遗产, 进而成为承载居民历史记忆、串联人

*通信作者 (Author for correspondence)
E-mail: maohuasong@qq.com

基金项目: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宋代城市风景的营建机制及空间模式研究”(编号: 51878087); 重庆市研究生科研创新项目“中心城区‘两江四岸’文化遗产的类型、分布及其集聚转化研究——以长江文化艺术湾区为例”(编号: CYS22061)

地精神联系、构建地方文化认同、塑造城市特色风貌的重要内容。然而由于遗产分级分类制度的局限性以及城市风景遗产内涵深入理解的缺失,在中国过去的保护实践中,保护对象主要为文化重要性较为显著且被登记为文保单位的遗产,重点关注单个遗产和遗产本体,忽略了承载遗产本体的原生自然文化环境以及遗产与遗产、遗产与城市系统间的紧密关系,从而引发了“遗产—环境”“遗产—遗产”“遗产—城市”之间关联与结构的割裂,导致城市风景遗产保护存在同质化、碎片化和孤岛化现象的同时,也限制了城市风景遗产可持续发展的可能。针对城市风景遗产保护理论和实践中面临的问题,目前中国出台的相关政策文件^[2-3]在加强关注遗产所依存自然环境保护的基础上,提倡将单点保护与整体保护结合并进行价值转化的遗产集群保护思路,为城市风景遗产保护工作的方向和重点提供了显著指导。

通过解读遗产保护理念的相关文件和学术研究^[4-6]可以发现,虽然学界对于遗产的集群没有明确定义,但是普遍认为遗产在生成时不仅会因共性的空间、功能、事件、文化等关联而集聚并呈现出集群分布的整体,并且还会在演变进程中,根据遗产或环境的改变而对要素或结构等内容进行调整,形成适应地域环境并不断发展的共生系统。由此可知,识别遗产在不同时代发展和传承的机制并保护遗产的集群整体,是最大化发挥遗产集群优势、使遗产可持续发展的根本手段。在此基础上,中国近年来基于遗产生成机制、演化成因、影响因素的集群保护研究日益增多,当下主要集中在例如传统村落与历

史聚落资源^[7-11]、线性文化遗产^[12-14]、大遗址保护^[15-16]等区域性的城乡文化遗产层面以及历史文化名城^[17-19]、历史街区^[20-21]等地方层面和工业遗产^[22]、抗战遗产^[23]等特定类型的建成空间,虽然文化遗产联动原生自然环境的集群整体性保护已然成为共识,但是以遗产中自然环境为主体的研究及保护自然环境的操作手段皆较少,同时对于相关的集群保护还停留在理论层面,缺乏相关实践探索和应用策略研究。

因此,本文将以自然环境为主体的城市风景遗产作为研究对象,通过整理城市风景遗产在保护中面临的共性问题,提出基于生成机制的集群保护策略是解决共性问题核心手段的观点;并基于集群的复杂性科学内涵,提出跨学科视角下的城市风景遗产集群保护思路;最后以重庆市两江四岸长江文化艺术湾区为例进行实例论证,识别地段内城市风景遗产,归纳不同历史时期的生成机制与集群结构,再结合地方限制条件提出城市风景遗产集群保护策略,从而构建可持续性的城市风景遗产集群保护体系,以期在在地化的城市风景遗产集群保护提供新的理论与实践借鉴。

1 城市风景遗产内涵及面临的保护挑战

1.1 城市风景遗产内涵

参考相关文件,城市遗产指“代表着社会、文化和经济方面的资产及资源,反映了世世代代所形成、阐释、传播价值观的动态历史沉淀,同时也反映了在世世代代的多样性中得到了认可的传统和经验的不断积累”^①;风景遗产指“包含绝妙的自然现象或

具有独特自然美的地带”^②“具有观赏、文化或科学价值,自然景观、人文景观比较集中,环境优美、可供人们游览或者进行科学、文化活动的区域”^③。而城市风景遗产不仅仅是城市遗产与风景遗产二者的交集,更关注的是在城市区域中,以自然环境为主导的,人为实践作用于自然并经历史沉淀而形成的结果及其过程。其中,城市区域指的是当下建成的城市环境;人为实践作用于自然的结果不仅包含当下留存的遗产资源物质要素和依附环境,同时还涵盖“遗产—环境”“遗产—遗产”“遗产—城市”之间的关联与结构;而人为实践作用于自然的过程则指城市风景遗产发展演变时期中形成相互依存、相互制约的人地关系,包括遗产如何生成、发展、变迁、适应的机制,以及演变过程中看待遗产的价值观念。

1.2 城市风景遗产面临的保护挑战

可以看出,城市风景遗产虽然是重点关注人地关系内容内涵的城市遗产与风景遗产交叉衍生出的概念,但基于风景遗产的概念理解可知城市风景遗产的研究对象应更偏向于城市中的自然。这部分“城市中的自然”往往直接或间接成为遗产的环境基础,主导着遗产的形成与发展,对这部分自然的保护不仅仅是地域文化原真性和完整性的重要体现,也是遗产走向集群保护的必经之路。然而城市风景遗产因保护意识和方法论的缺失导致城市风景遗产保护面临着同质化、孤岛化和碎片化的挑战:对因价值认识不足以被登记为文保单位却承载着地方记忆和居民认同的日常生活性城市风景遗产的忽视,以及

① 引自第三次联合国住房与城市可持续发展会议《人居三议题文件4-城市文化与遗产》。

② 引自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评定准则》。

③ 引自国务院《风景名胜区条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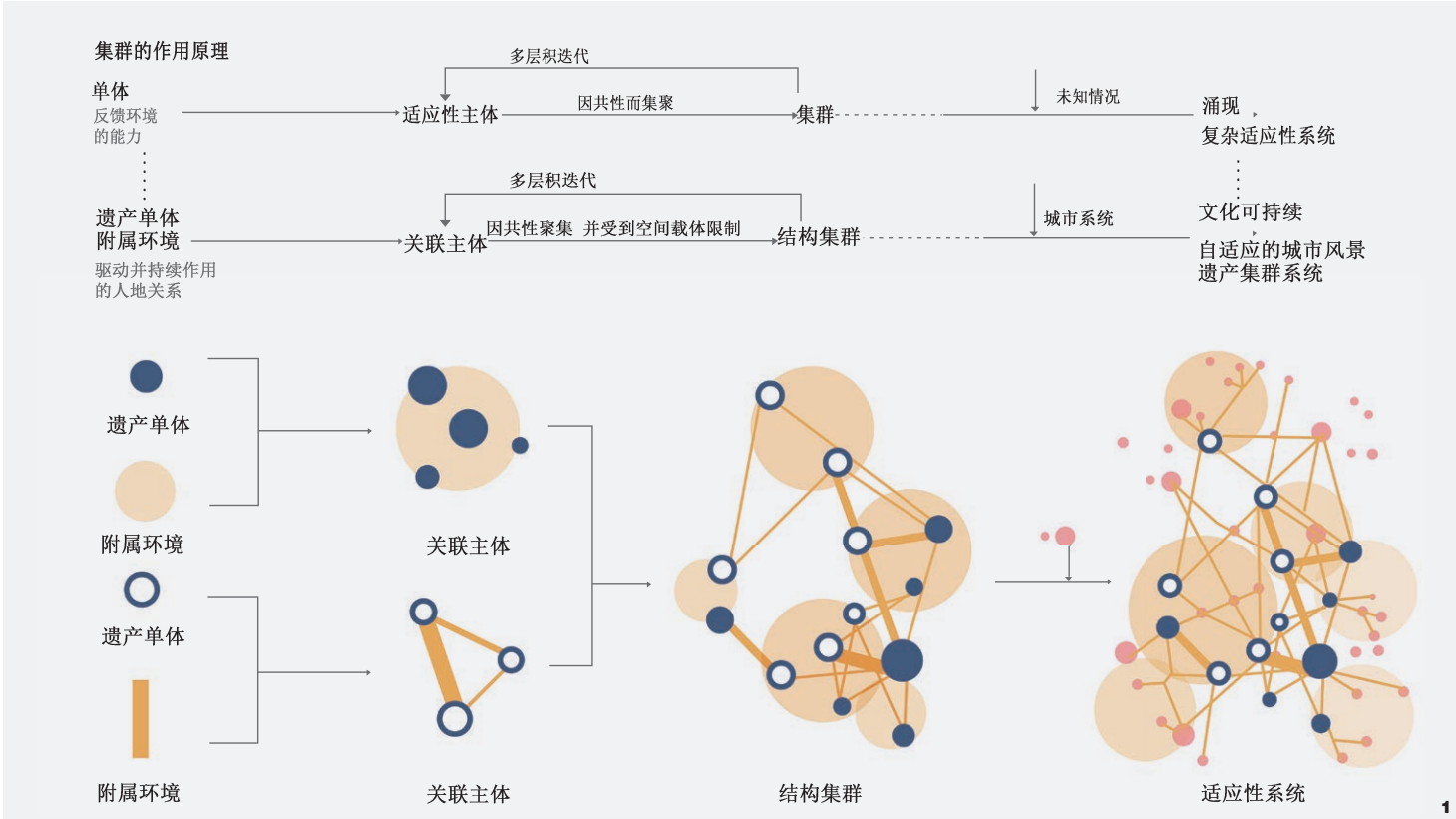


图1 集群的作用原理
Fig. 1 Principle of cluster

对城市风景遗产要素全面系统识别的缺乏而导致城市风景遗产面临着类型单一、丰富度降低的同质化保护问题；对遗产所依存的自然环境以及遗产与遗产、遗产与城市联系的不重视，导致遗产资源脱离原生环境而孤岛化存在的同时更难以融合城市发展，呈现出碎片化的集群不完全态。可见，从城市风景遗产原真性与整体性角度出发，构建城市风景遗产的集群保护方法具有重要意义。

与此同时，近年来由遗产历史结果保护转向对遗产历史过程保护的趋势逐渐明显，在遗产保护过程中越来越多的遗产形成因素、演化途径、生成机制被提及，说明遗产保护重点已然从现象外表蜕变至过程本质。正如金吾伦先生在《生成哲学》中认为物质

本身是不同作用手段使其显现出不同结果的观点^[24]，城市风景遗产亦是不同类型的人地关系作用下形成于地方自然环境的文化资产。因此，为了更加深刻理解和全面保护城市风景遗产，需要在城市风景遗产集群结果表征研究的基础上，展开对其生成机制探索：城市风景遗产是在何种人地关系作用背景下生成，又是在不同历史时代条件下演变和适应并得以保存至今。这不仅是解决城市风景遗产保护所面临问题的可由途径，也是在响应目前政策文件所倡导新时代集群遗产保护理念基础上对构建城市风景遗产保护方法的尝试与创新，能有效弥补城市风景遗产保护方法论与遗产集群保护方法论的缺失，同时还可以为其他类型遗产保护提供参考。

2 基于生成机制的城市风景遗产集群保护思路

2.1 集群的科学内涵

为了更加清晰地梳理城市风景遗产集群的生成机制，有必要先对集群的科学内涵进行理解。集群是指物体因共性结构而成为整体的过程与结果，是由适应性作为主要原因之一造就的复杂适应系统（Complex Adaptive Systems, CAS）^[25]的主要特征，出现在复杂性科学领域中，用以解释适应性主体集群、迭代并成为系统，涌现出复杂性的过程原理：系统成员因与环境不断交互而具备了“学习”或“积累经验”的能力，并且根据学到的经验改变自身结构和行为方式使系统成员之间具备某些共性而呈现集群现象，一起构成了

系统内具有适应性的主体，同时由于主体的适应性，主体在与当前环境和周边其他主体互动的过程中，往往会因协同或选择效应，形成新的适应性主体，从而实现层层迭代并形成新的系统。正是由于新系统的出现，一定会产生系统整体大于部分之和的结果，表现为新功能、新层级、整体新质等新内容和更复杂结构的生成，并由于整个过程的模糊性与不确定性，使得新系统生成的过程往往会伴随出人意料和难以预测的结果。

基于集群的科学内涵，在研究城市风景遗产时会发现，城市风景遗产作为人作用于自然而形成的结果，被人赋予了“能动的适应性”^[26]，由此可被看成“具有学习能力的成员”。在此基础上，可以将城市风景遗产的存在及其背后的生成逻辑看作一种复杂适应性系统，CAS理论帮助构建起城市风景遗产与集群保护理念路径耦合的同时，解释了城市风景遗产如何依据人地关系而成为集群，并实现可持续文化创生的过程。

2.2 城市风景遗产集群特征

人类由于自身需求或例如自然、社会、文化等外界干扰的驱动而作用于自然环境，从而实现城市风景遗产与环境“关联主体”的生成；与此同时，“关联主体”因其空间载体的制约条件，在协同效应或选择效应下相互聚集或筛选，形成具有不同关联属性、不同结构的遗产“结构集群”；随之，由于集群的多层级性，一个遗产集群往往会作为更高层级集群的基本单元参与构成高级的城市系统集群，在不断的层级与迭代下，形成复杂的、与地方环境相共生的“适应系统”，并且这个系统本身以及应对环境做出的改变，成为居民生活日常的同时涌现出了在地文化的多样性（图1）。由此可知，完备的城市风景

遗产集群往往具备以下的特征：

（1）“遗产—环境”的关联主体。单体城市风景遗产依据人地关系的作用而反馈于环境，遗产单体、反馈环境的能力以及反馈形成的原生环境，构成城市风景遗产集群的主体，往往主体依据人地关系作用逻辑的不同而具有不同的关联属性，呈现出基于空间条件、功能需求、事件触媒、文化内涵的不同关联。

（2）“遗产—遗产”的结构集群。城市风景遗产关联主体之间因关联的共性或差异而集聚或分化，在作用于环境的过程中形成结构，并依据结构集集成群。而城市风景遗产的作用对象一定是自然环境，所以其集群结构一定存在相应的空间载体，并且依据空间属性不同，表现出点状、线状、面状的外化结构特征。

（3）“遗产—城市”的适应系统。遗产集群与其余城市集群（基础设施、产业、管理、生态、经济集群等等）之间因为“新的共性”形成“新的结构”，并不断迭代形成更高级的集群系统，在多层级的环境反馈能力下，对环境的改变（自然影响因素、未来城市规划、城市发展状况等）作出预期判断，并表现出非线性、难以预测的复杂性。

2.3 基于生成机制的城市风景遗产集群保护思路

生成机制视角下的城市风景遗产集群，是城市风景遗产基于人地关系不断驱动并作用于在地环境而形成的适应系统，并在历史的时空层级性下，表现出复杂的涌现性结果。因此，在明确城市风景遗产集群特征的基础上，基于生成机制的城市风景遗产集群保护策略具有以下三个目的：

（1）保护城市风景遗产现有的遗产关联

主体，即遗产资源与作用环境。识别出在地城市风景遗产的特色文脉与文化特质，预防遗产资源的流失。

（2）保护遗产集集成群过程中出现的历史结构规律。归纳历史过程中的在地城市风景营建的经验和智慧，揭示其背后的潜在价值与内涵，并将其应用于城市风景遗产的保护和新城市风景遗产的塑造。

（3）保护遗产未来“与城市系统共生”的可能，在维护、完善现有结构的同时，考虑地方城市条件对集群结构的影响，考虑集群结构的更新以及成为适应性系统的可能。需要说明的是，在历史的发展中，许多城市风景遗产的驱动因子和作用过程已不复存在，以风景园林学科的专业眼光去发掘这些生成机制，对城市风景遗产集群的结构在现有环境下进行复现或是完善，不是为了复刻当时的人地关系，而是为了在保护现有遗产真实性、整体性的前提下，为遗产融合城市发展留下可能，播种出“历史和文化的根和种子”^[27]。

基于以上保护目的，结合城市风景遗产当下面临的保护挑战以及集群的科学内涵，提出“遗产资源识别—生成机制解析—集群策略建构”的保护思路（图2）。

（1）遗产资源识别。首先需要依据现状遗产保护中存在的对象原真性、环境整体性、功能完备性问题，界定合适的研究范围。其次通过资料检索和田野调查结合的方法，对研究区域内符合城市风景遗产定义的遗产资源进行系统性普查，包括遗产资源单体及其形成的环境基础。其中资料检索包括文字与图像类资料。接着以GIS作为辅助手段，将城市风景遗产进行时空标注，形成基础分析底图。最后以遗产人地关系内涵和结构载体进行类型划分，从而为下一步生成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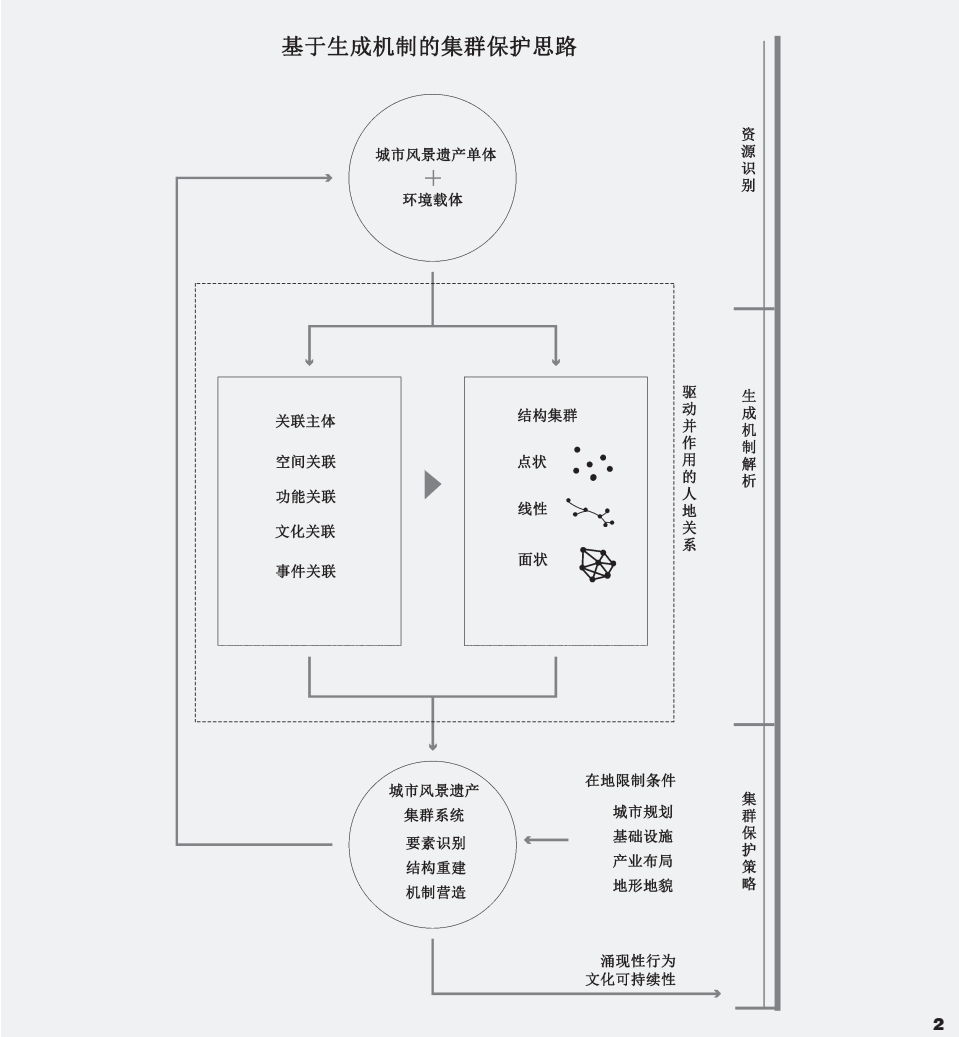


图2 基于生成机制的集群保护思路
Fig. 2 Cluster conservation strategy based on generative mechanism

制的解析做准备。

(2) 生成机制解析。人地关系作用往往依据历史发展而呈现出规律性和阶段性，因此解析生成机制时，首先在资源识别的基础上，结合地方城市发展史，对城市风景遗产进行分时段、分地段、分类别的历史切片划分。其次结合不同时段的历史地图、城市建设状况、文化事件、产业发展规律等，补足遗产文化基础信息，以便解析出信息真实、环境完整的生成机制。由于人地关系作用的

逻辑类型不同，城市风景遗产在集群时表现出空间条件、功能布局、事件触媒、文化脉络等关联。同时，不同时期人地关系或多或少存在各种关联，但由于历史阶段性的发展，不同时期人作用于自然的主导需求不同，生成机制的关联性也有所侧重，所以在归纳生成机制时应首先考虑突显其时代特色的部分。最后利用核密度分析工具，解析遗产的集群分布特征，归纳出遗产点状、线状、面状的集群结构。

(3) 集群保护策略构建。基于对完整城市风景遗产集群特征的理解，集群保护策略构建应分为遗产要素、关联结构及融合机制三方面。首先针对遗产要素进行全方面保护，不仅是遗产单体资源，还有其依存的自然环境；其次基于历史生成机制解析，保护与重建城市风景遗产集群关联结构；同时还需考虑历史集群结构融合当下城市发展的可能性，要在保有原先集群结构的基础上，结合城市地形地貌、基础设施建设、城市职能和产业发展等预期规划，积极发展新的结构，使其逐渐丰富为融合城市发展的适应系统。

3 重庆长江文化艺术湾区实例分析总结

长江文化艺术湾区是指长江流经重庆市大渡口区、巴南区、九龙坡区、南岸区的沿江岸线及其周边紧邻区域。其不仅是激活重庆文化价值的长江上游文化艺术中心，同时也是观赏山清水秀的主城滨江绿色生态长廊，具有良好的自然条件、优秀的地理区位以及悠久的人文历史。在人与自然不断作用的条件下，长江艺术湾区形成了数量众多、类型丰富、与日常生活密切相关的城市风景遗产。这些城市风景遗产在农耕时期依据山水基底形成了因地制宜的集群空间格局，又受到民国时期抗日战争的事件影响而丰富了其文化内涵，最后于建国时期在大院背景下形成了组团集聚、铁路串联的工业场企。然而由于在城市发展过程中对其保护工作的忽视，区域内的城市风景遗产呈现出碎片化、孤岛化的不完全集群状态，遗产资源要素、所属自然环境和关联集群结构正面临着逐渐消失，甚至消失殆尽的风险，同时也极有可能造成地方文脉不可复原的损失。因此，在长江文化艺术湾区迎来城市更新的契机下，通过对城市风景遗产进行基于生成机制的集群保护研究，不

仅能促进区域内城市风景遗产的整体性保护,实现城市自然环境和历史文脉的兼顾,也能在推动城市风景遗产与周边城市融合的同时带动地区空间优化和产业结构转型。

3.1 研究范围划定与城市风景遗产资源识别

(1) 参考相关规划文件以及基于城市风景遗产发展脉络完整性的考虑,从便于后期规划管理角度出发,综合用地布局、城市道路现状,将研究范围在原有规划文件规定的基础上扩展至鹅公岩大桥、南滨路—巴滨路、鱼洞长江大桥、长江艺术湾区西侧界定所形成的两岸城市风貌带。

(2) 以城市风景遗产定义为筛选标准,通过资料检索和田野调查相结合的方法,对两江四岸沿线及纵深方向符合标准的城市风景遗产资源进行系统性普查,其中资料检索包括明清时期的《重庆府志》《蜀中名胜记》《巴县志》,以及现代《重庆市志》《大渡口志》《九龙坡区志》《巴南区志》等系列文字类史料;《巴县舆图》《重庆古旧地图研究(上)(下)》《现代最新重庆市明细全图》《重庆市地图集》《重庆市地图册》等相关图像类资料。

(3) 将检索得到的284个城市风景遗产点进行空间定点标注,形成城市风景遗产名录图,并为后期分段生成机制解析及城市风景遗产集群分析提供分析底图(图3)。

(4) 为了进一步解析生成机制,探索不同物质空间载体与人为实践类型对不同类型城市风景遗产生成演变的影响,结合城市风景遗产检索的具体情况,将长江艺术湾区城市风景遗产按照空间载体类型分为山水、建筑、遗址、雕刻、墓葬类等;按照人为实践需求类型,分为精神信仰、山水审美、地方认知、生活形态、生产方式类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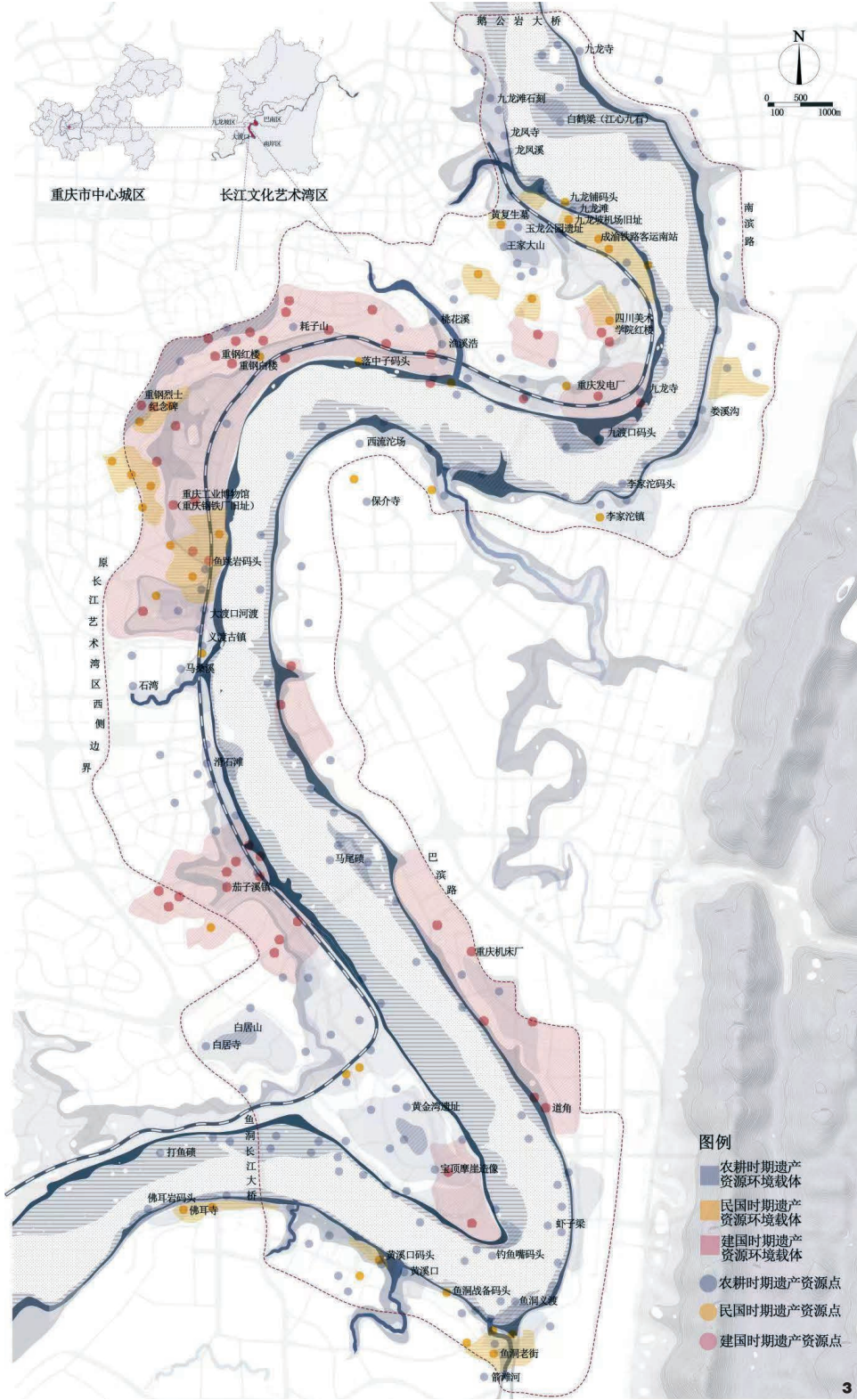


图3 城市风景遗产资源识别
Fig. 3 Identification of urban landscape heritage resources

3.2 分时段集群生成机制解析

依据城市风景遗产资源检索和现状调研结果，在参考《重庆通史》《近代重庆城市史》以及结合重庆城市发展进程的基础上，通过分析城市风景遗产历史演变特征，可将长江文化艺术湾区城市风景遗产的生成和变迁分为三个阶段：农耕时期（1911年以前），民国时期（1911-1949年）以及建国时期（1949年以后）。并在对应的历史底图上，通过分时段对城市风景遗产资源点及其关联环境载体进行标注，得到不同时期城市风景遗产分布图。再以GIS核密度分析方法解析其不同时期城市风景遗产集群分布特征及集群结构，并结合具体历史背景分析其集群生成机制（图4）。

3.2.1 农耕时期

通过对农耕时期196个城市风景遗产资源点及关联环境载体进行标注，发现该时期城市风景遗产中“遗产—环境”之间以空间为主要关联类型。结合GIS核密度分析，可知该时期城市风景遗产集群依托龙凤溪、桃花溪、李家沱场、马桑溪古镇、钓鱼嘴半岛，形成多个高密度聚集区，同时以山水骨架、场镇、驿道、航线、视线为空间载体，形成了线状与面状相结合的城市风景遗产集群结构。

结合农耕时期人为实践活动作用于自然环境的强度有限，其活动位置、范围和内容受到自然因素制约较大的历史背景，分析得出该时期城市风景遗产生成的主要原因是以农业为基础的生产生活活动：人口在生存资源充足的区域逐渐聚集并形成聚落，不断作用于自然环境形成固定使用自然资源的生产生活方式从而促进了城市风景遗产的产生，例如人们在地势平坦的平坝或靠近水系的缓

坡处建立场镇，如李家沱场、马桑溪古镇、西流沱场等；为了满足崇尚山水、祭祀先祖、祈福通行平安等精神需求，在江岸、崖壁、山腰、山顶等路线或视线可及之处设立如九龙寺、龙凤寺、白居寺等寺庙楼阁，最终形成岸与岸、江与岸风景相互交织的视线网络体系以及联通腹地与江岸的“场镇—道路—码头”空间模式。同时重庆典型平行岭谷地貌下形成的丰富单元，如滩、沱、坝、溪、梁、湾等，更是为该时期城市风景遗产类型的多样性提供了基础。

3.2.2 民国时期

通过对民国时期38个城市风景遗产资源点及关联环境载体进行标注，发现该时期城市风景遗产中“遗产—环境”之间以事件触媒为主要关联类型。结合GIS核密度分析，可知该时期城市风景遗产集群依托鱼洞码头、九龙坡码头、重庆客运南站、抗战兵工业旧址等形成多个聚集区，同时以两岸江滩及码头、平坝及厂房、边坡及公共绿地为空间载体，形成了点状与面状相结合的城市风景遗产集群结构。

民国时期城市生产力有所提高，自然条件不再成为制约城市发展的主要因素，在抗日战争的历史背景下，不同程度的历史事件推动了城市战时基础设施、工业的发展，分析得出该时期城市风景遗产生成的主要原因是以工业为基础的战时生产活动：为满足交通运输和军事防卫需求而修建的鱼洞码头、九龙坡码头、九龙坡机场、九渡口码头、电台湾、防空洞等基础设施；为满足战备需求而修建的重庆客运南站、成渝铁路、抗战兵工业（重庆钢厂前身）等工业设施。这些遗产在改变周围环境的同时，最终形成了新的抗战遗址类城市风景遗产，并且也因“重庆

谈判”“娄九军渡”“蒋介石登渡”等特定历史事件而被赋予新的文化内涵。

3.2.3 建国时期

通过对建国时期50个城市风景遗产资源点及关联环境载体进行标注，发现该时期城市风景遗产中“遗产—环境”之间以功能需求为主要关联类型。结合GIS核密度分析，可知该时期城市风景遗产集群依托重庆发电厂、重庆钢铁厂、重庆机床厂、四川美术学院等形成多个高密度聚集区，同时以工业、教育、铁路大院内外的公共绿地及生活性道路、成渝铁路及沿岸江滩为空间载体，形成了线状与面状相结合的城市风景遗产集群结构。

建国时期城市生产生活水平日益增长，在“一五计划”“三线建设”等历史时期政策的影响下，城市中出现了大量的工业与教育建筑，分析得出该时期城市风景遗产生成的主要原因是以工业为基础的日常生活性活动：具有核心功能的车站、工厂、学校向周围城市空间扩展，形成了功能主导、体系完备的大院片区，如铁路南站片区、黄桷坪教育片区、重钢工业片区，为了满足日常生活的需求，各个片区向内延伸出生活性道路网络，连通院区核心绿地；成渝铁路肩负起运输功能，串联多个工业片区的同时，也形成了以崖壁、边坡、堡坎、江滩为特色的带状、工业演替类城市风景遗产。

3.3 基于生成机制的集群保护策略构建

在理解城市风景遗产“遗产—环境”关联主体、“遗产—遗产”结构集群、“遗产—城市”适应系统的集群特征基础上，结合城市风景遗产资源识别与分时段集群生成机制研究结果，考虑城市风景遗产融合城市地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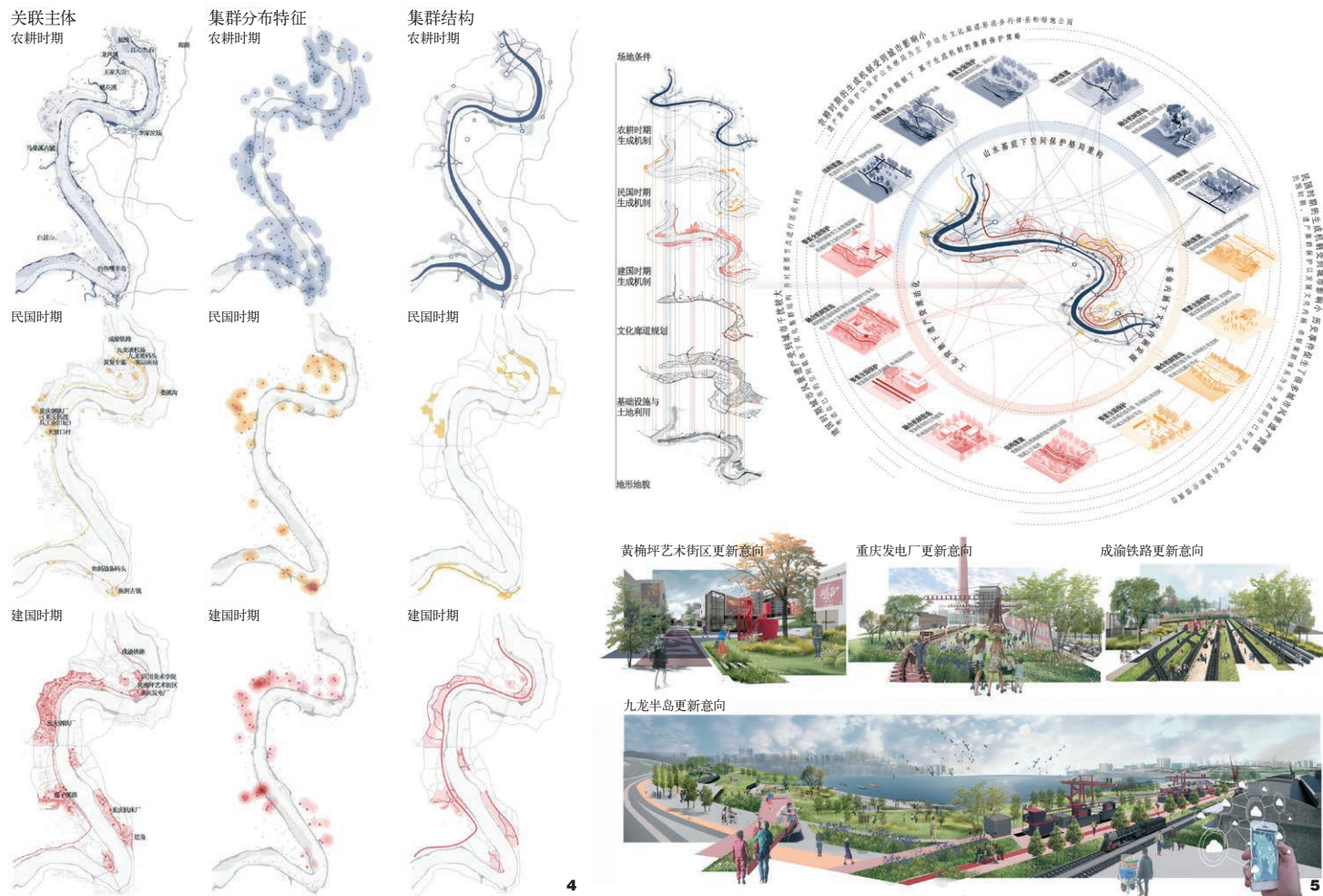


图4 生成机制解析
Fig. 4 Analysis of generate mechanism

图5 集群保护策略构建
Fig. 5 Cluster conservation strategy

地貌、基础设施、产业发展和未来规划的可能，提出全面要素保护、结构关联重建、融合机制营建的保护策略，从而不断完善、更新城市风景遗产集群结构，使其成为适应当代城市发展的集群系统（图5）。

3.3.1 全面要素保护

依据城市风景遗产“遗产—环境”关联主体内涵，遗产的全面要素保护应该包括遗产单体与附属环境的物质部分，以及遗

产与环境相互作用过程的非物质部分。比如农耕时期的马桑溪依靠道路连接古镇与渡口形成空间关联，对其进行要素保护时，保护对象除了马桑溪、古镇、渡口、道路外，还包括“古镇—道路—渡口”的空间模式；又例如民国时期的九龙坡机场依靠“重庆谈判”的历史事件而形成事件关联，保护对象除了机场遗址以及机场的附属环境，还应包括事件背后蕴藏的历史史实记载与精神文化内涵。

3.3.2 结构关联重建

城市风景遗产过去往往形成集群并存在集群结构，然而其在城市迭代过程中因为意外或人为的各种因素而被逐渐破坏，导致城市风景遗产集群中存在的稳定性与完整性逐渐被减弱。由此，需要在识别“遗产—遗产”间历史集群结构的同时，有选择性地优化或重建。比如农耕时期形成的“山水基底上不断由水系延伸至腹地的道路空间结构”以及“两岸山水交互下的视

线结构”，皆可以考虑以城市公共空间步行体系或是城市景观眺望系统为依托对其原有关联结构进行重建和优化；工业时期的城市风景遗产依据功能呈现出“铁路串联大院的关联结构”，可考虑在优化原有空间结构的同时识别并保留其背后隐藏的产业结构以重建其功能关联。

3.3.3 融合机制营建

现有城市风景遗产常常因具备的历史集群结构不适应当代城市生活而未能与城市形成良好互动关系。因此，需要在全面保护遗产要素和重建关联结构的基础上，通过不断调整、更新其集群结构，完善其适应性机制，从而更好地与城市融合，形成“遗产—城市”的适应性系统。以民国时期黄复生墓、九龙坡机场、九龙坡码头三处城市风景遗产呈现出的面状集群关联结构为例，随着时代变迁，其关联结构因城市道路干扰而变得分散，故而可以考虑结合堡坎、崖壁、江滩等形成立体短途文化线路，在提升其步行可达性的同时，重构三者的集群结构，从而有效实现城市风景遗产的保护和融合。又如建国时期的成渝铁路因功能需求串联起沿线的各个工业大院，但随着时代变迁，成渝铁路的货运功能被取消，大院片区的生产功能也不复存在，所以可以考虑结合生产生活过程中遗存的演替类工业景观，保持成渝铁路和大院片区空间格局的同时进行功能产业的置换，形成特色文旅线路或文创片区，使其顺应城市发展的潮流。

4 结语

城市风景遗产作为地域文化的见证，是以人地关系下的生成机制为纽带，以共性关联为内涵，以环境载体为结构的集群系统，

但正是由于其环境主导的特殊内涵，城市风景遗产在潜移默化滋养着地方文化的同时，也更容易受到冷落与忽视。基于生成机制的遗产集群保护理念犹如一把钥匙，让人们在重新审视城市风景遗产的同时，为知晓历史、理解现在、应对未来挑战提供了新的手段。对城市风景遗产的保护是以生成机制为前提的集群保护，是探索集群体系如何融入城市发展的保护，不仅仅是保护遗产原真性、整体性、可持续性的核心，也是城市精神文明建设中文化遗产转型、建立地方认同感、传承城市记忆的关键。

注：文中图片均由作者绘制。

参考文献

- [1] 谢凝高. 风景遗产科学的核心论题[J]. 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1, 48(03): 104-108.
- [2] 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 关于在城市建设中加强历史文化保护传承的意见[EB/OL]. [2021-09-03]. http://www.gov.cn/zhengce/2021-09/03/content_5635308.htm
- [3] 中共中央宣传部, 文化和旅游部, 国家文物局. 关于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全面加强历史文化遗产保护的通知[EB/OL]. [2022-02-20]. http://www.gov.cn/xinwen/202202/20/content_5674766.htm
- [4] 张成渝. 国内外世界遗产原真性与完整性研究综述[J]. 东南文化, 2010(04): 30-37.
- [5] 阮仪三, 李红艳. 真伪之问: 何谓真正的城市遗产保护[M]. 上海: 同济大学出版社, 2016.
- [6] 张松. 历史城市保护学导论: 文化遗产和历史环境保护的一种整体性方法[M]. 上海: 同济大学出版社, 2008.
- [7] 张兵. 城乡历史文化聚落——文化遗产区域整体保护的新类型[J]. 城市规划学刊, 2015(06): 5-11.
- [8] 邵甬, 陈欢, 胡力骏. 基于地域文化的城乡文化遗产识别与特征解析——以浙江嘉兴市域遗产保护为例[J]. 建筑遗产, 2019(03): 80-89.
- [9] 何依, 邓巍, 李锦生, 等. 山西古村镇区域类型与集群式保护策略[J]. 城市规划, 2016, 40(02): 85-93.
- [10] 郑志明, 焦胜, 熊颖. 区域历史文化资源特征及集群保护研究[J]. 建筑学报, 2020(S1): 98-102.

- [11] 张松. 作为人居形式的传统村落及其整体性保护[J]. 城市规划学刊, 2017(02): 44-49.
- [12] 李广伟. 区域史观视角下河南茶路城镇形态演化及其集群化保护研究[D]. 郑州: 郑州大学, 2021.
- [13] 张依依. 京杭大运河对其沿岸聚落的空间分布影响研究[D]. 济南: 山东建筑大学, 2019.
- [14] 霍艳虹. 基于“文化基因”视角的京杭大运河水文化遗产保护研究[D]. 天津: 天津大学, 2017.
- [15] 朱海霞, 庄霆坚, 权东计, 等. 后疫情时代基于特色文化空间构建的大遗址文化产业集群空间规划机制研究[J]. 中国软科学, 2020(S1): 92-100.
- [16] 庄霆坚. 基于特色文化空间构建的大遗址文化产业集群空间规划机制研究[D]. 西安: 西北大学, 2021.
- [17] 阮仪三. 历史文化名城保护实践的新探索[J]. 中国名城, 2011(07): 10-13.
- [18] 邵甬. 从“历史风貌保护”到“城市遗产保护”——论上海历史文化名城保护[J]. 上海城市规划, 2016(05): 1-8.
- [19] 李和平, 张相展. 城市历史景观视角下的历史文化名城保护研究——以河北明清大名古城为例[J]. 小城镇建设, 2019, 37(01): 102-112.
- [20] 阮仪三, 孙萌. 我国历史街区保护与规划的若干问题研究[J]. 城市规划, 2001(10): 25-32.
- [21] 李佩玲, 毛华松, 彭浪, 等. 关联性视角下的三峡库区文物复建区活态保护策略研究——以奉节夔州古建筑群为例[J]. 中国园林, 2021, 37(12): 81-86.
- [22] 刘宇. 后工业时代我国工业建筑遗产保护与再利用策略研究[D]. 天津: 天津大学, 2016.
- [23] 吴涛. 城市集群性抗战遗产的保护利用研究——以重庆为例[J]. 中国文化遗产, 2015(04): 28-39.
- [24] 金吾伦. 生成哲学[M]. 保定: 河北大学出版社, 2000.
- [25] (美)约翰·霍兰. 适应性造就复杂性[M]. 周晓牧, 等译. 上海: 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 2019.
- [26] 吴良镛. 人居环境科学导论[M]. 北京: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2001.
- [27] 费孝通. 文化的传统与创造[J]. 文艺研究, 1999(03): 28-34.